



.2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吉林省教育局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吉林省教育局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过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98,000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书号：7091·1022 定价：0.27元

前 言

在这教育战线繁花似锦的明媚春光里，我们向读者介绍一批优秀“园丁”的先进事迹。他们是为培养新一代作出了贡献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人民教师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辛勤“园丁”。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用满腔心血浇灌着祖国的花朵，培育着年轻一代。

人民教师是无产阶级教育的捍卫者。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广大教师深受迫害，遍遭凌辱。但是许多优秀教师不怕扣帽子，不怕打棍子，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循循善诱地教好学生。坚守无产阶级教育阵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

光荣的人民教师，历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粉碎“四人帮”之后，为革命而教有功，为革命而教光荣，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尊重人民教师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扬。

向辛勤劳动的老师们致敬！

编 者

一九七八年六月

目 录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培养人才

..... 吉林大学教授 唐敖庆 (1)

排除干扰 坚定信念 为提高

青年学生科学知识水平做贡献

..... 吉林市二中 尤 异 (14)

听毛主席的话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 吉林医大第四临床学院 王 烈 (24)

为创建我国沼泽学贡献力量

..... 吉林师大地理系 柴 岫 (32)

为高速度发展冶金工业培育人才

..... 长春冶金地质学校 刘济生 (45)

为提高教学质量勤奋工作

..... 吉林师大附中 朱维伦 (52)

学雷锋精神 做革命园丁

..... 集安县朝鲜族中学 崔善玉 (58)

做贫下中农欢迎的牧铺教师

..... 奈曼旗巴布利合公社 散旦戈日布 (65)

排除干扰 坚持教育革命

..... 乾安县余成公社结润小学 于广和 (70)

砸碎精神枷锁理直气壮地大干教育革命

..... 东丰县东丰镇第一小学 郑淑芝 (78)

破私立公 争人夺魂

——我怎样做后进生的转化工作

…………… 吉林市七中 华淑秋 (85)

倾注满腔心血 共同努力育人

…………… 舒兰县 七 中 李振华 (94)
…………… 十五中 李玉琴

决心又红又专 努力搞好学校体育工作

…………… 长春市第六中学 高铁林 (104)

创造条件 自制教具 努力上好理化实验课

…………… 双辽县双山公社乔木中学 张 武 (112)

退休不下岗 精心育新人

…… 梨树县泉眼岭公社新发堡小学 王亚霖 (120)

热爱党的教育事业 苦练教学基本功

…………… 蛟河铁路中学 宗世杰 (126)

精心培育祖国的幼苗

…………… 和龙县龙水大队幼儿园 李月顺 (132)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培养人才

吉林大学教授 唐敖庆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跨进了新的发展时期。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上，向我们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的庄严号召。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这场长征的先头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我们这支战斗在教育战线的队伍，怎样做到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

我是教育战线上的科学工作者，昔日被“四人帮”及其同伙咒骂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臭老九”，今天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这在两年前，只是做梦才敢想的事。想到这里，我无比崇敬华主席。无比痛恨“四人帮”和我省前主要负责人祸国殃民，把我省的科技队伍、教育战线糟踏得不成样子。

我和我所在的研究室，几年来一直从事化学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四害”猖獗时，这是最犯禁的。“四人帮”

一次又一次地在科技、教育界向党进攻时，总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一贯倡导和重视的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上首先发难。他们在各地的科技、教育部门天天“闹地震”，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总是处于“震中”，遭到破坏最严重。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接连对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发动三次猖狂进攻。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七二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针对“四人帮”对科技、教育工作的严重干扰破坏，多次发表谈话，作出批示，要我们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我们研究室开始恢复工作，承担了国家下达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项目的协作任务。为使这项研究坚持下来，深入进去，我们感到有必要弄清理论、路线和思想的是非，首先是弄清楚如何正确对待所谓十七年的科研、教学工作，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基础理论研究问题。支部发动党内外群众，学习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调查研究，展开辩论。同志们肯定了解放以来，我国的科技、教育工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根本性质的改变。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现有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努力为党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过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缺点，要改正，但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不能把婴儿同洗澡盆里的水一起泼掉。党支部总结大家的意见，在全系大会上发了言，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应当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科研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应当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是大学理科的重要任务。这个发言，实质上是把我们对“四人

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由内心的愤懑，转向公开的反抗，是要挣脱他们强加于我们的精神枷锁。不出所料，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向我们反扑过来。说我们的发言是“资产阶级分子翘尾巴”、“三否定的典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右倾回潮的突出表现”。接着，以基本路线教育为名，公然打出“运动的重点是干部和教师”的黑旗，对抗毛主席的历来教导，根本颠倒敌我关系，扬言抓所谓的“三否定分子”，把我们的支部书记列为重点整的对象，并强行取消了他参加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资格。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真批周。我校也掀起一股反对周总理的黑浪。他们凌驾党委之上，大掀所谓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把我校一百二十八名中层以上干部，打成“旧班底”、“复辟基础”。他们为了达到反周总理的罪恶目的，故意在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上大作反面文章。他们明明知道周培源同志的文章是根据周总理指示写出的，却首先提出要批判；他们明明知道是周总理指出过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科技战线占主导地位，却把我们拥护周总理指示的发言作为“大毒草”进行“声讨”。他们还把我说过“有些科学技术我们现在又落后了十年”，作为典型的右倾言论进行批判。甚至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搞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什么用？”当时，我们为普及、提高我国量子化学的研究水平，筹备好了一个量子化学讨论班，通知已经发出，有的学员已到校报到，也硬被他们取消了。

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毛主席身患重病，“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又是先从教育、科技界进攻。通过他们控制的报刊、电台，连篇累牍地攻击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助纣为虐，

在我校制造了五个所谓“右倾翻案”的典型事件。其中三件就是直接打向我们研究室的。一是，我们研究室在一九七五年原《教育革命通讯》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介绍了我们坚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些体会。由于这篇文章引用了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关于科研应走到建设前面的指示，被定为“助了右倾翻案风的一臂之力”。二是，一九七五年八月，我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和上级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建议在我校建立一个理科研究所。因为这件事，就说我是“被资产阶级利用了”，是听了“修正主义的话，刮加强基础理论，破坏三结合开门办科研的风”。三是，一九七五年十月，我校为教育部将要召开的大学理科座谈会准备了一个《汇报材料》。这个材料，针对“四人帮”对我校的严重破坏，强调要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到应当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搞好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注意学好书本知识；要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培养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高质量高，数量多的人才。在这个材料的准备过程中，我曾经写信给校党委，说起：“李先念副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打电话要教育部注意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希望我校为参加理科座谈会作好准备”。他们把这个材料定了五大罪状，摘录整理登了简报，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赶忙在简报上批道：“这个材料是很错误的。在吉大搞班子整风中作一个重要的典型事例解剖”。这样，在党委爬坡时，就把这个材料同“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放在一起进行了批判，说它“在指导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奇谈怪论”；“比

较系统地宣扬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采取修正主义手法，篡改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要害是从领导权、办学道路、培养目标、教师队伍各方面，否定教育革命，妄图把学校拉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老路上去。”很清楚，“四人帮”及其党羽，是借批这个材料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爬坡会上，他们还让我“深挖”，“爬个陡坡”，实际上，是要我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跑。

面对“四人帮”的重重压力，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主要想到三个问题：

1. 我是解放后在党的帮助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冲破阻力回到祖国来的。我见过旧中国科学落后、受人欺侮的情景。我相信，我也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归根到底，是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为此，就必须搞好基础研究，实现技术革命。不搞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国家就将吃大亏。我应当努力在科研上做出成绩，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我也希望能为渴望回国的海外科学工作者一旦有机会回国工作时创造一些条件。

2. 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为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我能作出的贡献，莫过于搞好科学研究，为党培养一些人才；屈服于压力，放弃应该担当的任务，我就不可能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3. 我想得更多的，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回国以来，二十多次见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多次见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在政治上的进步，业务上的提高，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到每一

个重要时刻，毛主席、周总理总是热情地肯定知识分子的进步，鼓励我们不断革命，永远向前。毛主席在他的光辉哲学著作中，在对坂田昌一教授的著作以及有关自然科学问题的许多谈话中，都讲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周总理更是多次指示，亲自扶植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指示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就是总理给我们下达的战斗命令。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下定决心，无论压力多大，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不能停。

有一次，我作学术报告，空旷的教室里只坐了二十几人。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从未有过的冷落。我的一个助手，见此情景，含着泪水对我说：“唐老师，我们搞基础理论研究，是为国家作贡献，这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受这种窝囊气？”我身边的几个中年同志，要求离开学校。我劝他们：

“我们没有错。有毛主席、周总理支持，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筹备的量子化学讨论班被取消了。我们就应邀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办。可是，到那儿不久，王洪文的“小兄弟”又放出风来说：“吉林来的讲什么学？怎么开到我们上海来了？”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有些化工生产问题，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某些预测的结果。这竟被他们攻击是“学术权威贩卖唯心论”。他们要把我们赶走，我们偏不走。在有机所党的领导和科研人员的支持下，我们硬着头皮把短训班办下去。两个多月，我冒着酷暑，写了二十多万字的讲稿，两名助手帮我抄表、画图、辅导答疑。有一次，由于过于疲劳，我晕倒在课堂上，清醒之后，我坚持继续把课讲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在白天的研究时间被挤掉了，就坚持在晚间干。大的学术报告无法开展，就在室内、组内搞。大家共同探讨攻关重点，交流研究经验，一直没有间断。我的眼病日益严重，双眼都已近视到一千七百多度，医生告诫我，不能再看书，否则有失明危险。但我心里总是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我不能不看书。凡是遇到我们研究组的同志，我就主动地同他们讨论学术问题，询问研究进展情况，相互勉励，共同前进。

我们七个研究组，六十六名专职科研人员，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坚持工作。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完成了九项研究任务，发表了三十六篇科学论文，提出研究成果报告十一份，译著和编写科学书籍、资料十八种。“四人帮”在这期间，对基础理论研究搞了三次破坏，我们在这方面迈出了三大步。一九七三年，发表了“分子氮络合物的化学键理论”研究成果；一九七五年，把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由定性讨论阶段推进到了半定量阶段；一九七六年，发展了分子轨道的图形理论。同时还充实和提高了一九六六年作出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配位场理论”。这些工作，是当代化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量子化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主要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自己的理论观点、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这些成果，为我们合成理想性能的化合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我们攀登化学科学的高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储备。

在开展研究过程中，我们还为有关单位举办了三期短训班，使三百多名科研人员在基础理论上得到了提高。我们自己通过科研实践，通过学术交流、学术报告等办法，也提高了业务水平。在我们研究室，初步形成了一支敢于打硬仗，

勇于攀高峰的研究队伍，有了几名较好的业务骨干。

我们深深地感到，斗争的胜利，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当归于毛主席。是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给了我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强大动力。坚决按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办，就无往而不胜。

(二)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速开展了量子化学的理论研究。在我国第一次量子化学会议上，提出了七篇报告，许多兄弟单位比我们前进的步子还大。这表明，我国的科技工作，三十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有了较好的基础。

在向科技现代化进军中，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教育战线极为关心，寄托着无限的期望。指出“科学的发展基础在教育”，“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要我们高等学校成为“教育中心，科学中心”。我理解，科技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能不能尽快把教育搞上去，又是能不能实现科技现代化的关键。我下定决心，在有生余年，和同志们一起，为使学校成为“两个中心”，为给国家培养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才，贡献更多的优秀科学成果而奋斗。

这是个很艰巨，很光荣的任务。我深切地感到，要完成这个任务，应当着重抓好四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抓纲治校。彻底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彻底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和势力，整顿好领导班子。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追随“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打击排挤革命干部，压

制广大师生员工的革命积极性，使我校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我校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土崩瓦解。我们一定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一定建立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懂得党的政策，热心科学，热心教育，众望所归的领导班子。抓好揭批斗争，抓好班子整顿，这是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认真贯彻，把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学校真正成为“教育中心、科学中心”的基本保证。

第二，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强调在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拿来主义”和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上马。

“四人帮”把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诬为“爬行主义”。这是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派胡言乱语。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人只能研究弯钩犁、打算盘、熬土硝，而不能使用和研究外国人发明的拖拉机、计算机和原子弹，等等。他们这一套，不仅是爬行，而是名副其实的倒退，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无知阶级，是要把社会主义中国倒退到黑暗愚昧的旧中国。

我们说的“拿来主义”，是坚持周总理指出过的“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方针，把当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直接用于我们的科研和生产实践。这样做，可以少走，甚至不走前人已经走过的许多弯路，赢得时间。而且有助于我们实现赶超。我们能在量子化学的研究上取得一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拿来主义”。

在学习过程中，要在那些关键问题上和进一步突破的方向上下工夫。学时就要有超的雄心。这样才能鼓实劲，学得深，用得好，赶超得快。

单有“拿来主义”还不够。因为“拿来”的先进技术，

它终究还是限于已有的基础理论的框框中。我们要使赶有后劲，跑到前面去，还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在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上有突破，有独创，有储备，有学派。依据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实现技术上的重大变革。

高等学校能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去培养造就人才；能不能把基础研究搞上去，为我国的技术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和储备，这是高等学校能不能成为“教育中心、科学中心”的基本标志。

第三，要加强大学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在大学里，不但有一大批科研力量，有较好的科研工作基础，而且学科齐全，便于联合作战，是有条件搞好科研工作的。问题在于组织。为适应今后科技工作发展的需要，我认为有必要在高等学校，特别是在重点高等学校里，建立若干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研究室、研究所。要由水平较高的人担任业务指导，使人力物力相对集中，使我们的研究力量由全局上的劣势变成局部的优势，加速对某些重大课题的突破。这在国外，已是成功的经验。最近，国家批准在我校建立理论化学研究所，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要三年大上，培养人才，打好基础，立足于赶；八年大干，重点突破，立足于超；在本世纪内使我国的理论化学，包括量子化学、统计化学、结构化学和计算化学的研究水平全面达到或个别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理论化学队伍。

第四，在人才的培养上，我们要抓好对重点人才的培养，抓好培养工作中的重点环节。

“四人帮”最大的一个罪恶，是摧残了我国一大批人才，造成了现在我国科技队伍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尽快造就人才，是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当前，是形势喜人，形势

逼人。对我们教育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就是逼在怎样才能尽快地向科技战线输送数量多、质量高的人才。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能对国家做出贡献的最要紧的也在于培养人才。

从我们学校看，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这些年来，教师中大多数人业务荒疏，基本上不甚了解六十至七十年代科学发展的状况。现在，很需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进行业务上的再学习。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重点在于培养出一批能带研究生，能讲好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应当选拔一批政治觉悟高，业务基础好的教师进行重点培养。特别应当重视对四十岁左右的有较好业务基础的教师的培养。这些同志，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各方面都比较好的人才，是经过长期考查、精心选拔，留在高等学校的。在“四害”横行时，他们是反对“四人帮”的中坚力量，因此“四人帮”对他们感到“最难办”，最深恶痛绝。他们的工作，最累，又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很重。但是他们坚定、顽强，只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是完全有可能迅速成长起来的。办法是办训练班、进修班、讨论班和派往国外进修学习。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有些大学的有些课程开不出来，办了几期训练班、进修班，就较快较好地解决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我们办了一期物质结构讨论班，选了三十多人参加。他们系统地学习了有关的基础理论，又参加一定的科学研究，业务水平显著提高。现在都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有的已经独立带研究生，多数参加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我们要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另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就是大力招收研究生。今后，重点科研单位、重点大学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应当逐步由相当于研究生毕业的人员充实起来。